

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思想特色

李 隽

(山西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霍克海默从批判传统理论入手,以对人的研究为落脚点,通过对独裁国家的分析和启蒙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初步建构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系统而深入地批判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跨学科研究和批判的先河。

〔关键词〕 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5)06-0029-03

马克思逝世后,世界资本主义形势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了严重的曲解。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要求思想家们做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结论,卢卡奇、科尔施、霍克海默等人也都以此为契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或解构,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标示现实。当卢卡奇、科尔施在理论上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而开始动摇时,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任务就落到了霍克海默的身上。

20世纪20年代高潮迭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把霍克海默推向了马克思主义。面对理论上的失误以及革命实践的反差,霍克海默带着解释过去的错误和准备未来的行动的双重希望,开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酝酿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与传统理论决裂:社会批判理论的起点

霍克海默首次正式提出“批判理论”的知识形态,是《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在这篇论文里,霍克海默正式把“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确定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在这一基础上,他不仅对“传统理论”作了批判性考察,而且力图对“批判理论”本身做出规范,为其制定理论纲领。因此,研究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从剖析这篇论文入手。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就是同“传统理论”相对立的理论。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旨在帮助社会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旨在推翻这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地从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的结论,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出现的。

霍克海默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者之间的对照为实例,来阐明“传统理论”同“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实证科学把资本主义的存在当作“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以便把它归结为供分析的事实,通过劝告资本家怎样更有效的发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去帮助资本家;反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力求通过把资本主义彻底解剖为对异化劳动的剥削,而为用革命实践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知识,它认为,对于“事实”,不能当作“直接的所与”来理解,而必须按照其历史根源和关系来理解,必须历史地和辩证地来考察,就是说必须从对立的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事实。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实证主义把社会科学的“事实”的存在理解为和谐的,把它的价值理解为永恒的。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当把“科学知识”的这个理想、模型应用于自然时,它有效的推进了我们的认识,即使是假设性的知识;反之,当把它应用到社会时,它却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因为在社会科学中,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对“客观性”的强调就隐藏着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这个事实。在表面上看来,经济制度似乎是按照供求“法则”生产“货物”和“服务”的机械,但是,遭到忽略的实质却是:这些经济范畴所描述的无非是对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异化的、非人化的社会关系罢了。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体现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基础。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一种人道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设想成对经济概念的否定,首先是对所谓公平、等价交换概念的否定。与专门的科学的操作不同,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对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哲学性质的,

¹ 〔收稿日期〕2005-08-21

〔作者简介〕李隽(1977-),女,河北保定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助教、哲学硕士。

它的内容是由把支配着经济学的概念颠倒成它们的对立面来形成的。把公平交易颠倒成扩大社会不公正,把生产力颠倒成限制生产关系,把维持社会生活颠倒成人民的苦难。

所以,霍克海默说,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立场,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传统理论”同“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是从主体的不同中、而不是从客体的不同中产生的”。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唯一关心之事是加速一种应当导致没有不公正的社会的发展”,“批判理论除生来就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二、对“独裁国家”的分析:社会批判理论的早期阐述

霍克海默早期对“批判理论”的阐述集中体现在《独裁国家》中,他用“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分析、批判了“独裁国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分析,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有关原理。

霍克海默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从政治色彩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新政”并列在一起,称作“独裁国家”,这是改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方向和内容的重要一步,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把当代社会作为统一的工业社会来进行批判的先河。

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出现了“独裁国家”呢?霍克海默将之归结为是由于东、西方都爆发了激烈的革命的缘故,苏维埃国家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激烈的社会动荡的产物。他强调,激烈的革命,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顶多只是创造了一种更好的统治术,即建立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他还认为,“独裁国家”的出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受必然规律支配”的宿命论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烈冲突中所诞生的是高度自由、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形形色色的“独裁国家”。可历史的实际发展正好与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相反。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怀疑。因为独裁国家消灭了市场,却给了资本主义统治新的保养地,计划生产更好地滋养着群众,又反过来被群众更好的滋养。革命的力量没有表现出来,工人组织被溶合到国家中去了。俄国的情况也已不再提供希望了。他说,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发展是按照逻辑的必然性的,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能被抹煞”,“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忠实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能被割断的,新生事物不可能先于它的时代而出现”。但是,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即认为历史总是服从于一个确定的规律的”,事实上,“现在和过去不可能服从同一规律。一个新社会的建立也是这样。”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出批评的基础上,他初步论述了“批判理论”的历史观。指出,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批判理论”所注重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他说:“批判理论则完全不同,它舍弃人们所依赖的绝对知识,而使历史正视自身中具体可见的那种可能

性”。从这一点出发,他又指出,“批判理论”是不相信“革命条件”是否成熟此类谎言的,“对于革命者来说,条件通常都是成熟的,关于目前条件不充分之类的谈话掩盖了对压迫的容忍态度”。

在他看来,急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能导致产生“独裁国家”,所以竭力主张革命应是自发的、渐进的。他提出的具体途径是建立自发的“工人委员会”,他认为,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上升为权力。

三、启蒙辩证法: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观点

如果说《独裁国家》主要批判了现存社会,那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则把批判矛头指向整个人类文化,指向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在这里,社会批判理论已经不再是简略的立场和纲领,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批判”,它首创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提供了一种标准的模式,正是这本著作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思想基础。

这种批判是以对启蒙的批判的形式进行的。他们通过论证人类的启蒙怎么样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不断衰败的成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就是论证“启蒙运动的目的总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其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都处在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况”。就是说,“启蒙”运动不断以内在精神的丧失换取了外在物质的享受,以开明进步为理由,要人们服从与日俱增的秩序和权威,这就是“启蒙辩证法”。这种“启蒙精神”的特征是:把自然界和人类变成对抗性的主体——客体关系,确立人同自然、人同他人关系中的“征服和被征服”、“统治和被统治”。文明进步带来的是对人性的摧毁,它在“外在自然”方面解放了人,却在“内在自然”方面奴役人。

启蒙精神就这样在使人摆脱愚昧的同时,又由于追求一种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因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并产生了两大恶果:其一,知识成为工具。只注意使“知识”有助于人对自然的利用和统治。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的整个文化、知识归结为一种共同的尺度——纯粹量的尺度。其二,人异化为物。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给人带来了大自然的支配,但另一方面,人类并没有得到解放。

为具体说明上述情况,他在书中提出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所谓“文化工业论”,实质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代名词。他们之所以这样重视和强调这种批判,是因为看到了3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上台,认为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使用文化手段,征服了群众的心理意识。加上后来作者在美国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这就是把“技术理论”和“消费至上”原则结合起来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文化这个字眼在这里被赋予了最广泛的意义,人类的一切都被视为文化活动,发达工业社会就是“文化工业”社

会。

从上述霍克海默对“启蒙精神”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鞭挞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类文化。究其根源,这是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在他们身上的回光返照。正是在这里,霍克海默开始使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带上了严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并把这种悲观主义思想一直反映到他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上面,反映到对社会发展前途的展望上面。也正是在这本书里,霍克海默开始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开创了对“发达工业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法兰克福式批判的先例。

四、对人的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的落脚点

在《人的概念》一文中,霍克海默对现代哲学家研究人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认为,现代哲学家研究人的特殊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方面承认存在抽象的人;另一方面抽象地研究人。在他看来,抽象地研究人实际上是要回避“我们一切经济奇迹背后暗藏的罪恶”。肉体之所遭受的种种痛苦由于听信了人格为重的高见,而被蒙混过去了;精神之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也由于假想了一个在遭受精神痛苦的处境下仍能成为自己,而得到了缓和。

他认为,要改变现代哲学家这种抽象地研究人的局面,唯一的途径就是把人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观察。注意剖析社会与个人的彼此影响,特别是社会对个人的作用。他强调:“个人只有作为他所归属的整体的一分子才是实在的。他的基本判断,他的性格爱好,他的习惯和世界观,都根源于社会,都根源于他在社会中的命运。”霍克海默强调把人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观察,通过剖析社会的现状来把握生活于这一社会中的人的特点。霍克海默一直反对把个人和社会当作对立两极的异化,正如他在哲学中否认主客体的相互排斥一样。这显然受到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和社会辩证关系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对劳动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问题的强调,却不看重。《黄昏》中说:“使劳动成为人类活动的超越性范畴是苦行者的意识……由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这一概念,就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不难看出,相较于某些现代哲学家而言,霍克海默对人的研究更深刻。但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相比,还是肤浅得多。因而,他的批判也显得缺乏深度和力度。

从霍克海默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他也承认这种现实的人有个体和社团之分,但这种作为社团的人,在霍克海默那里,决不构成阶级。他说:“今天,不管每个阶层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多么专心于真理,他们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因而,从这方面看,就“不存在可以由对批判理论的接受而加以指导的阶级”。反过来说,如果批判理论本质上在于系统阐述某个阶级在任一给定时刻的感情和观念的话,那么,它与具体的科学学科就不会有结构上的差别了。由此,霍克海默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因此,对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简单描述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阶级的真理。同样,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内容的系统描述,

也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存在和利益的真实图像。”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社会批判理论究竟有何作用呢?霍克海默似乎喃喃自语地说:“……它除了关心消除社会不公正以外,并没有特殊的影响”。

五、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色

(一)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对社会作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跨学科研究之先河。1930年,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人文科学被分裂为一些彼此分离的学科,从而不能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的图像深表不满,提出要与这种“片面专业化”的研究方式相抗衡,创立一种“集各门学科之精华”,“从整体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哲学”,而且,他对社会哲学进行了初步的定义。他指出:“社会哲学既不是一种专门为社会生活的定义提供高傲的义理之哲学价值理论,也不是五花八门的科学成果的综合。而是这些科学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根源,它是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the universal would not be lost sight of)的一个架构”。这一主张显露了后来“社会批判理论”的端倪,也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新的思想来源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开辟了社会研究所的未来。法兰克福学派从产生到现在,虽然其代表人物几经更迭,但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方式却始终没有变更。

(二)从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性、批判性出发,逐步瓦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只强调理论的批判功能,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20年代初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不但继承了那种通过“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所提出的,强调作为实践主体的工人及其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继承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做法,因此,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对卢卡奇、科尔施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这种理论。虽然整个说来他们都注重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早期思想家的批判更多地是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而霍克海默则扩大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前者多从肯定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后者则是从否定方面来批判意识形态。特别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异化现象,对其危害进行社会心理分析与探索,他不满足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某些思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以便张扬人的批判思维和否定意识。

(三)提出“社会批判理论”时,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了“传统理论”特别是其方法论的基础——“实证主义”。他把自己的理论阐述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由于“崇拜事实”而不能辨别历史的“否定性”,就必然导致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法国学者M·洛威在论述法兰克福(下转第100页)

(上接第31页)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时指出,“坚决地否定现存制度并强烈地反对实证主义,这两个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相辅相成的,并表现出否定的辩证法的统一性”。

(四)继承了卢卡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在《启蒙辩证法》中将其朝纵深方向推进,甚至追溯到远古神话同启蒙的对立,使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更具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总体的辩证法与理性主义曾形成对立,并同无产阶级达成一致的话,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这里,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形成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卢卡奇的认识路线,但在认识形式与阶级主体的一致性原则上,霍克海默则脱离了卢卡奇的原则。从而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科技理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规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方向。

霍克海默构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框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逻辑上的论证,并初步将其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相比,霍克海默的理

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色彩尤为浓厚。所以,西方有些研究者把他的理论直接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所谓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外矛盾的激化,他的后继者在怎样把社会批判理论应用于对现时代的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这些分歧终于使他们分道扬镳。但是,无论他们的理论怎样千差万别,他们理论的主题是一样的,那就是由霍克海默首创的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2] Andrew• Arato, “Frankfurt School” [M]. New York, 1978, 3, 106.

[3] Horkheimer,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M]. New York, 1974, 9- 10.

[4] M• 洛威. 法兰克福学派理性的马克思主义[J]. 人与社会, 1982, (65- 66).

责任编辑 王瑞娟